

试论洪业在索引学上的成就

顾 志 华

在中国近现代索引史上,不可否认洪业是一个极其突出的人物。他1932年完成的《引得说》,是一部关于索引学的重要论著。而他亲自创办并长期担任主任一职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,则是我国最早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编纂中国古典文献索引的学术机构。自1930年9月宣告成立,到1951年冬天停办,二十一年时间,引得编纂处一共编印出引得64种81册,其中正刊41种50册,特刊23种31册,开创了我国有组织、有计划、系统地、大规模地编纂现代索引的历史。这一套大型汉字索引丛刊的问世,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巨大成绩,标志着中国索引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。

有人认为类书是我国最早的索引,也有人把唐代元和年间林宝编的按声韵序列的《元和姓纂》当作索引的开端,这是不正确的。索引必须具备索引源、索引款目、排序方法和原文出处四个基本要素,而类书和《元和姓纂》并不完全具备这些基本要素,至多只是具有索引的部分结构和功能。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,把类书看作是索引的来源之一,应该是恰当的。《元和姓纂》也只能认为是索引的雏形。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索引,当以明代万历年间张士佩编制的《洪武正韵玉键》为最早。由于《洪武正韵》按平水韵排序,知者较少。张士佩按部首法编制了这部书,作为《洪武正韵》的书后索引。这一索引的刊行,距今已有四百余年。明末傅山编制的《两汉书姓

名韵》,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人名索引。这两部索引,名称上虽未标“索引”两字,但都具备了索引的四个基本要素,对后来索引的编制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进入二十世纪,随着用西方科学的读书方法和治学方法“整理国故”的兴起,索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。用科学的方法编制索引,已为许多有识之士所认识。1917年,林语堂在《科学》第三卷第十期发表《创设汉字索引制议》一文,第一次强烈呼吁创设汉字索引系统。1923年,胡适再次宣传索引的功能,提倡为古籍编制索引,“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,一概编成索引,使人人能用古书。”^①两年后,何炳松在《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》的文章中,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系统编制中国古籍索引的设想,主张“甲部先编六经,乙部先编二十四史,丙部先编十五子,丁部先编唐宋诸儒文集”。在此基础上,再依次扩充,“得一完备之《四部索引》,并再进而及四库以外之著作。蔚成大观,而索引之能事毕矣。”^②1928年,万国鼎明确指出:“中国索引运动,已在萌芽矣。”^③这是“索引运动”一词的首次出现,具有很大的意义。他还开始讲授“索引与序列”这门课程,索引作为一个学术门类被提上日程。1930年,钱亚新的《索引和索引法》出版,这是我国第一部索引学专著。全书对索引的定义、范围、功用作了细致的阐述,对编制索引的具体程序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讨论。这一著作的出版,表明了中国索引学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和完成。

在这一股强劲的“索引运动”中,洪业后来居上,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,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。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丛刊的诞生,一大批索引的编纂与出版,使他在索引学上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学者,在中国索引学的发展史上,写下了浓重而又辉煌的一页。

洪业(1893—1980),谱名正继,学名业,号煨莲,福建侯官(今福州市)人。他自幼酷爱学习,聪颖过人,寄读于城南外祖父家中。

11岁(1904年)时,随父亲洪曦徙居山东曲阜任所,熟诵杜甫诗文,后考入济南山东师范附属中学,数、理、化各科之外,兼习英语,成绩优秀。17岁返回福州,就读于鹤龄英华书院(后改名英华中学)。五年后毕业,因品学兼优,获书院美国董事克劳弗德的资助赴美留学。1917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,获文学士。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,获文学硕士。1920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,获神学士。

1923年,洪业受北平燕京大学之聘,回国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,后兼大学文理科科长(教务长)、图书馆馆长。他曾代表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多次磋商,争取到了霍尔基金会的资助,最终促成了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,洪业就任北平办事处干事。洪业在美国留学时,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西方的学术,同时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,很注意治史方法和工具书的编纂,再加上他有良好的国学根基,对传统的国学深具心得,这使他能够较好地融汇中西学术,成为在当时领潮流之先的一代学人。他回国特别是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,这些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。他精心制订了图书馆管理制度,扩充采购国内外新出版的图书杂志,对古籍善本图书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。在他的大力提倡下,哈佛燕京学社设立了引得编纂处,他亲自担任主任一职。从1930年起,引得编纂处把中国最主要的经书史籍有系统地重新校勘,加编引得和词汇索引,取得了很大的成绩,为当时正在兴起的“索引运动”推波助澜,使索引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。

一、《引得说》,洪业编制引得丛刊的理论武器

洪业明确指出:“引得是一种学术的工具,学者用之,可于最短时间中,寻检书籍内部之某辞或某文。”^④洪业重视引得,重视工具书的编纂,正是出于治学的需要,力求为大家提供一条快捷的途径。洪业注重使用工具书,与他少年时代背书常挨责打很有关系。

所以后来教书,决意不令青年学子蹈自己少时的覆辙,处处留心学术工具的使用。至于为什么用“引得”而不用“索引”,他认为“引得”一辞,乃从英文index一词翻译出来的。“英文中之index原意谓指点假借而为一种学术工具之名。日本人译之为‘索引’。中国人沿用日译,或转变而为‘索隐’。我们改译作引得,不过以其与西人原词之音与义皆较近而已。”^⑤由于长期受到美国学术文化的熏陶,所以洪业的治学带有更多的西方色彩,这是他宁可使用“引得”一词而不用“索引”一词的原因所在。在中国索引史上,索引还有过其他一些名称,如韵编、通检、备检等,虽然用词不同,但表达的意义是一致的。

对于“引得”的作用,洪业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。“我常想:编纂这些书的人,虽算不得有什么阐扬圣道、方轨文章的大功,但只就其曾为学者省了一分心血,已可谓是一种功德。”^⑥“若许书籍,何从读起?无目录,则难以知其种类;无引得,则难以探其内容也。然则引得者,助人多读书,助人善读其书之工具也。”^⑦“为学者省了一分心血”,“助人多读书,助人善读其书”,这正是引得极其重要的功用,也是编纂一切工具书所要达到的目的。洪业在著书立说的同时,把编制引得看作是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,从理论上对编制引得的重要意义作了充分的论述。《引得说》是洪业长期研究引得编制心血的结晶。它的发表,对中国索引事业的发展,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编制引得一定要方便实用,这样才能助人多读书,助人善读其书,起到工具的作用。洪业认为使用什么样的检字法对引得是否方便实用关系很大。过去使用的以诗韵为检字法、以部首为检字法不仅难学,而且难用,实有改进之必要。笔画检字虽比前二者便利,仍不够完善。在长期的研究与实践中,洪业创制了一种全新的检字法——“中国字庠”检字法,在《引得说》中全面地作了介绍。洪业认为“中国字庠”检字法的优点,一是比较地易记,二是排起来较

整齐,三是同码之字甚少。所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的引得,全部使用中国字皮撚这种检字法,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当然,以今天的眼光看,中国字皮撚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检字法,随着科学的发展,索引编制技术的不断提高,这种旧的检字法基本上已经被淘汰。

洪业在《引得说》中对中国书引得编纂的方法也作了详细的论述。从开始选题到最后出书,他把具体工作归纳为十个步骤。第一步:选书。选定某书或某专题来编引得。第二步:选本。选定要编引得之书的最好版本。洪业主张“选本之标准,我们务于‘可靠’及‘流通’二者并得。”^⑧所谓“可靠”,指文字无误;所谓“流通”,指易于求得。所以使用社会上通行的善本是最为理想的。第三步:标点。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步骤,“实为引得全体之关键。”^⑨按照书的性质及引得编纂要求,将应作为标目的字、词勾出。第四步:抄片。将勾标完的书,用白卡片抄录,每条款目抄一片,注明原书的卷页。第五步:校片。主要是更正抄片的错误。第六步:编号。将校片按中国字皮撚法排列。第七步:稿本。将校片抄写成稿本。第八步:印刷。确定引得的格式,以既美观大方又节省成本为佳。第九步:印本校对。对排印出的清样进行校对,做到完全无讹才付印。第十步:加序。写出序言,叙述原书著撰的来历,以及版本的源流,并对其价值进行评述。经过这严格的十个步骤,引得的编纂才告完成。洪业通过多年的试验摸索,总结出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,为后来大规模地开展引得的编撰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指导。这是洪业对索引学的巨大贡献。《引得说》这一有价值的著作也成为了编制引得强有力的理论武器,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二、洪业领导下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

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个下属机构,是由洪业提议并亲自负责组建的。1928年创立的哈佛燕京学社是

美国哈佛大学与中国燕京大学的一个联合学术组织。其本部设在哈佛大学,在燕京大学则设北平办事处。学社的创办宗旨是研究汉学,后定为东亚学,主要从事购买图书、收藏古物、出版、资助学者交流、培养研究生等工作。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来源是美国人霍尔捐赠的一笔美元股票遗产。霍尔是一个发明家,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后因发明用电分离铝土矿石而致富。他去世前,在遗嘱中指定其遗产的一部分作为进行亚洲及中国文化研究之用。由于取得了大约450万美元的经费,使燕京大学一举成为一个国际汉学研究中心。

洪业决定召集几位志同道合者开展这项工作,并草拟了引得编纂工作计划,提交哈佛燕京学社讨论,在总部的支持下,引得编纂处于1930年9月正式宣告成立,并立即开始了引得的编纂。它的建立,标志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专门的索引编纂机构的诞生。引得的编纂,既扩大了传统文化学术的传播范围,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术工具革命。美籍华人陈毓贤女士充分肯定了洪业的这一成就。“他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的一系列参考书,可说是20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。把中国最主要的经书史籍有系统地重新校勘,用现代眼光加以评估,并加编引得(索引)和词汇索引。如果我们说这些引得在中国研究古籍的学术上创立了新纪元,可能也不算夸大其词。”^⑩

引得编纂处的建立,使洪业编制引得工作有了一个重要的阵地。由于有经费的保证,使这项工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。引得编纂处刚建立的时候,设主任一人,由洪业兼任,主管编纂处的全面工作。下有编辑三人:田继综、聂崇岐和李书春,担任编纂、校印引得的工作;经理一人:马锡用,负责处理来往信件及各项杂务;另有抄录员五人,抄录各种稿件和引得卡片。三年后,聂崇岐升任副主任,专主编纂工作。引得校印所增设后由李书春兼任主任,负责校印事务。全处工作人员连同正副主任和编辑在内,始终没有超过十五

人,是一个极有效率的学术机构。聂崇岐是洪业的学生,因家庭经济困难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燕京大学读书,毕业后到中学教书。洪业把他请回到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主持编纂业务。聂崇岐为人耿直,博闻强识,办事说一不二,有“铁面御史”之称。他在引得编纂处做了许多具体工作,是洪业的得力助手。李书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人才,善于开源节流,他负责引得编纂处的排印,排印工人可直接从卡片排字成书,大大提高了工作速度。洪业知人善任,分工明确,实施了科学的管理方法,充分调动引得编纂处每个工作人员的积极性,各项工作都进行得有条不紊,始终保持了很高的效率。

引得编纂处1930年9月一成立,就立即投入了引得的编纂工作。为了速见成效取得经验,洪业对首先选择什么书编纂引得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反复的斟酌。他定下了两条原则,第一是重要而常用的书,第二是篇幅不太大的书。因为重要而常用,所以有价值;因为篇幅不太大,所以容易完成,早出成果。“故开始的时候,不拟为繁重的书籍编引得。”“《说苑》、《白虎通》、《仪礼》之流,篇幅不甚重,不必久延时日即可出版,故我们选来做试验。”^①1931年这第一年就完成了五部引得,即《说苑引得》、《白虎通引得》、《考古质疑引得》、《历代同姓名录引得》和《谈史年表附引得》。1932年有《仪礼引得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》、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者引得》、《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》等七种;1933年有《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》、《佛藏子目引得》、《世说新语引得》、《容斋随笔五集综合引得》等八种;1934年有《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》、《水经注引得》、《清代书画家字号引得》、《毛诗引得》等十种。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工作的有序,引得的编纂也就由小到大由简到繁,一些大部头的重要典籍的引得也先后编制完成,如《春秋经传引得》、《杜诗引得》、《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》等。中国传统的十三经,引得编纂处编纂了其中十二经的引得,只有《尚书》由顾颉刚编辑另行出版。前四史即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,先秦

诸子中的《庄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荀子》等重要古代文献都编纂了引得，使引得的编纂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广泛性。

在编纂引得的同时，洪业还亲自写了不少序文，如《白虎通引得序》、《仪礼引得序》、《礼记引得序》、《春秋经传引得序》、《杜诗引得序》等，其中《礼记引得序》、《春秋经传引得序》是现代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。《礼记引得序》又名《两汉礼学源流考》，作者细致勾勒了两汉礼学的源流，把两千多年来关于礼学的争论梳理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由于此文的杰出成就，洪业赢得了法国铭文学院的赞赏，荣获1937年度的茹理安奖金。《春秋经传引得序》洋洋十万言，详细论述《春秋》和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左传》的可靠性，以及作者、版本等问题，极有价值。特别是运用现代天文学的科学知识来证实《春秋》的确是当时的实录，不是凭空杜撰，更是发前人所未发。在《春秋》提到的37个日蚀中，有30个根据现代天文学家的计算是正确的。这是洪业对中国传统经学的重要贡献。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丛刊的影响，推动了引得编纂处工作的更深入开展。

三、洪业编制引得丛刊的成就与不足

自1930年9月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成立，至1946年应哈佛大学之邀赴美讲学，洪业一直担任引得编纂处主任之职，主持工作长达十六年。洪业离开北平后，引得编纂处还存在了五年，由他的学生聂崇岐、齐思和等人负责。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来源，有一个固定的高素质的编辑班子，有一套规范化的编纂程式。他们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。在这中间，洪业应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1. 洪业编制引得丛刊，开创了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编纂中国古籍索引的新的途径。

哈佛燕京引得丛刊以丛刊的形式编纂索引，在中国索引史上称得上是一个全新的创造。以前的索引编制，基本上都是分散的、

个别的,缺乏系统性。洪业纠正了这一状况,运用现代科学方法,有组织有计划地大量编制古籍索引,从而把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。引得编纂处成立伊始,洪业就制订了“引得编纂手续纲要”,贴在编纂处墙上,做为编纂引得的工作指南,从一开始就把这项工作纳入一个科学的轨道。这个“引得编纂手续纲要”,对引得编纂每一个步骤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,使编纂工作做到规范化、科学化。这一编纂方法经过两年的试行,取得了很好的效果,洪业在自己的索引学专著《引得说》中作了深入而全面的总结。

洪业主持编制的引得丛刊,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:逐字索引、篇目索引、专名索引和关键词索引。逐字索引在西方称为concordance,洪业把它译成“堪靠灯”,即“词索引”。由于以字为标目,所以详尽细密,用处很大。对一些重要的典籍,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春秋经传》、《尔雅》等,都一一编成了逐字索引。这些索引成为了哈佛燕京引得丛刊的主干。篇目索引如《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》、《一百七十五种日本期刊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》等。专名索引如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者引得》、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》等。关键词索引如《说苑引得》、《白虎通引得》等。这些索引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。索引的编制,一方面吸取了中国古代类书和早期索引编纂的经验,另一方面大量采用了西方先进的索引技术。洪业作为一个既具有扎实的国学根基又有着良好的西学修养的学者,在融汇中西学术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他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,创造了编纂古籍索引成功的范例。自1943年起,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组编纂出版了通检丛刊1-15号,很显然受到了哈佛燕京引得丛刊的影响。洪业的开创之功,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。

2.洪业编制引得丛刊,取得了科学管理出效益的成功经验。

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工具书编纂机

构,在其存在的二十一年时间中,一共编印出引得64种81册,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。这和编纂处的人员设置、经营管理有很大的关系,更是和洪业本人的领导才能分不开的。从引得编纂处的筹办到工作正常运行,在人、财、物的管理上,在具体工作的安排上,洪业倾注了巨大的心血,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

在人员设置上,洪业十分重视编纂人员的素质。他认为人的因素是决定引得编纂质量的关键。他重用自己的学生聂崇岐、李书春等人,让他们负责引得编纂处的具体业务。这两人也没有辜负洪业的期望,长期担任他的助手,协助他完成各项工作。聂崇岐学术造诣很深,是知名的宋史专家,有《宋史丛考》等多部著作问世。他为引得写的序言,以史部、集部为多,《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序》是最为精彩的一篇。序文详考古代各家目录之优劣,相当于一部中国古代目录学简史。此外,他的弟子著名学者齐思和、翁独健等人也先后参与了引得编纂处的一些工作。齐思和撰写了《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》、《庄子引得》、《墨子引得》、《荀子引得》的序言,翁独健整理了《道藏子目引得》。除编辑外,抄录员和排印工人也十分称职,能很好地胜任工作。引得编纂处编纂的64种81册引得,虽然不能说至善至美,但错漏之处还是比较少的。

在经营管理上,引得编纂处也很有特点。合理的分工,规范化的经营管理,再加上有一套科学的编纂方法,使引得编纂工作自始至终能做到有条不紊地进行。规范化的经营管理,表现为编辑、抄录、排印各项任务界限分明,分工明确,每一个人各司其职,各负其责,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。各部门之间通力协作,没有扯皮之事。经费既做到专款专用,又坚持节约为本,对这笔霍尔基金会资助的基金,从不大手大脚地乱花。这使得编纂处的经费,始终能比较充裕,不仅解除了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,也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。科学管理出效益,引得编纂处的出色工作,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。

3.洪业编制引得丛刊,发扬了敢于超越前人的创新精神。

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力。洪业在编制引得丛刊的过程中,处处充满了创新精神。“我常想中国旧籍之所以没有引得,颇与中国字难检有关系。”他认为检字法的好坏是编制引得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问题。“我们中国类似引得的书,如《佩文韵府》、《经籍纂诂》、《史姓韵编》等,往往以诗韵为检字法。然而中国字的音读,不仅随地而异,又且古今不同,非惯于做诗押韵的人,不易知道某字是在一百零六韵中的那一韵。”^②而部首法、笔画法也有种种不便。洪业从1919年起,就注意如何为中文书籍编制引得,开始解剖汉字作新检字法之试验。他吸取了林语堂、王岫庐等人的经验,在聂崇岐、李书春、田继综等人的帮助下,于1930年创制了“中国字庋擷”这个新检字法,并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大力推行。

洪业编制引得丛刊,在出版形式、体例与编排设计等方面,做到统一规范。出版形式采用比较统一的开本、装帧、版式和字体字号,全套引得给人以一种整体感。体例与编排设计新颖、整齐划一,引得各部分基本上按序、凡例(叙例)、辅助检字、文献原文(仅特刊有)及引得正文的顺序排列。由于采用统一的体例和编排设计,充分表现出整套丛刊的特点,方便了读者对全书的使用。另外,为了使引得丛刊更好地为公众服务,提高使用效率,洪业在索引类型的配置上也下了功夫。他根据不同的索引对象,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索引类型对其加以揭示。重要典籍多用逐字索引;诗文别集多用逐句索引;传记资料多用专名索引;一般文献则用关键词索引。这样做不仅能从较佳的角度揭示原文的实质内容,更重要的是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的检索要求。创新精神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当然,引得丛刊的编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。首先,洪业创制的“中国字庋擷”检字法比起原有的检字法,虽然有了一定的改善,但仍不能算作一种完善的检字法,它存着繁琐的弊病。随着科学的发展,索引编制技术的不断提高,越来越显得使用不便。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丛刊全部采用“中国字庋擷”检字法,给没有掌握这个检

字法的读者带来了困难,从而影响了引得丛刊的使用。今天重印引得丛刊,这一问题必须得到完善的解决。其次,绝大多数引得的编制是很有必要的,但仍有一些引得如《刊误引得》、《考古质疑引得》、《苏氏演义引得》等读者使用较少,而且原书卷帙单薄,检索起来并不费事,为其编制引得价值不大。虽然这在丛刊中只占少数,仍应说是一个缺憾。第三,部分引得的收书范围、条目取舍、版本选用等均有不妥之处。如《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》、《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》、《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》收录了一些不属于传记性质的书,造成体例不纯。《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》中的《宋诗钞》、《北宋经抚年表》、《南宋制抚年表》,就是明显的误收。而《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》中温睿临的《南疆逸史》,没有采用原书,而是使用了李瑶的改编本,在版本选用上不合适。此外,引得丛刊的卷首一般都有很长的序文,大多为名家所撰写,有着很强的学术性。洪业所作的《礼记引得序》、《春秋经传引得序》是现代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,也是他自己的代表性论著。但这些序文与引得本身并无太大的联系,引得作为一种工具书,重要的是它的使用价值,而不是进行学术讨论。长长的序文增加了引得的篇幅,完全可以单独刊行。

注:

①胡适:《发刊宣言》,《国学季刊》1923年第1期。

②何炳松:《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》,《史地学报》1925年第3卷第8期。

③万国鼎:《索引与序列》,《图书馆学季刊》1928年第2卷第3期。

④⑤⑥⑦⑧⑨⑪⑫洪业:《引得说》,中国现代学术经典《洪业卷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9、16、10、23、48、53、46、24页。

⑩〔美〕陈毓贤:《洪业传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6年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